

園林植物與中國文化認同

• 葉曉青

近年來，在中國研究領域，有無統一的中國文化認同是一個受到注意的問題。一般國外學者趨向於認為並無統一的中國文化認同；國內學者雖不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區域研究的繁榮使地區差異性及中國文化的多元性得到足夠強調。

當十九世紀歐洲植物採集者終於有機會進入中國北方時，他們極其失望，因為他們在苗圃或花園看到的植物，跟在廣州、澳門見到的沒有差別。他們納悶：為甚麼中國人要選擇種植與本地自然條件全不相應的花木呢？

中國文化異乎尋常地重視植物的文化象徵，從兩千多年前的《詩經》開始，即把植物當成文化符號、比喻。在漫長的歷史中，植物一直是文學（主要是詩歌）中不可缺少的主題，人們通過文學來「認識」植物。這篇文章旨在探討植物作為文化象徵到底是如何產生，如何成為個人情感的、人格的甚至政治的表達方式，以及外來植物是否參與這一過程。

一 花木的文化象徵與選擇

園林植物的象徵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類。

(1) 以花木作為季節象徵。如以竹、蘭、菊和梅代表四季的花中四君子；或是依花開季節，按月排列「花月令」。「花月令」最早見於據說是傳自夏代的曆書《夏小正》，以後歷代都有不同排法，但都以當令花木作象徵，如正月梅花，二月杏花，三月桃花，四月薔薇，五月榴花，六月荷花，七月葵花，八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芙蓉，十一月山茶，十二月臘梅。

《夏小正》將不按季節開放的花木看作不祥之兆，後世繼續將這類反常視為妖異之象。關於景物的描寫也往往因此固定成式，如桃紅柳綠便是固定的春天景色，少了便不成其為春。

(2) 以植物為象徵，比喻人的道德、人格或外貌。如從《詩經》開始，桃李用來比喻青春年少，嬌豔美好，「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唐時更有「人

中國文化異乎尋常地重視植物的文化象徵，從兩千多年前的《詩經》開始，即把植物當成文化符號、比喻。本文旨在探討植物作為文化象徵到底是如何產生，如何成為個人情感的、人格的甚至政治的表達方式，以及外來植物是否參與這一過程。

* 此文是壓縮稿，全文及完整註釋將刊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www.cuhk.edu/ics/21c)，有興趣的讀者可到網上瀏覽。

花木是傳統文人甚至政治人物向外界傳達資訊的方式。一個人失意做隱士或抗議世道混濁，他一定會種植菊、梅、竹、蘭一類代表清高、純潔的花木，絕不會選擇像牡丹這樣象徵世俗成功的花木。

面桃花」之說法。眾所周知，蘭、竹、菊、梅、荷等均代表道德操行的高尚。

(3) 植物成為情緒象徵或人生感歎。如唐以後梧桐與愁的聯繫；以夏天才開的石榴花比喻生不逢時、錯失機遇；陶淵明也以木堇的朝開暮落比喻人生的短促、無常：「采采榮木（木堇），結根於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憔悴有時。」

(4) 植物也用來作吉祥象徵，如桃子為長壽象徵，石榴多子，牡丹為富貴。以前富貴人家都在庭院中種玉蘭、海棠、牡丹，取「玉堂富貴」的好吉兆。連皇家也如此，頤和園樂壽堂前的玉蘭還是乾隆從南方移來的。

文人往往將花木比作「客」或「友」，如蘇東坡有「梅寒而香，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之說。宋明清學者文人均有將各種花人格化的比喻：蘭為靜友，竹為直友，蓮為淨友，松為高友，菊為節友，梅為清友。又有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蘭為幽客，等等。擇友取善，所以選擇花木也不可考慮每種花木的象徵，植物的觀賞價值反而成為次要的了。康熙在造承德避暑山莊時為強調選擇花木的重要，不知為甚麼引了晉代大將軍張天錫的自辯：「於山莊之中，玩賞芝蘭，則生於自愛德行，褒獎臣下德行之心；看到松、竹，則想到人貴有骨氣，保持清廉節操。」

花木是傳統文人甚至政治人物向外界傳達資訊的方式。一個人失意做隱士或抗議世道混濁，他一定會種植菊、梅、竹、蘭一類代表清高、純潔的花木，絕不會選擇像牡丹這樣象徵世俗成功的花木。陶淵明隱居種菊自然廣為人知，即使近代也不乏這類例子。近代北京園林中以收集菊花著名的契園就是一例。契園主人劉文嘉（1884-1962）日本留學歸來後參加了清

代末次科舉，中「舉人」，授七品京官，分配至黑龍江管理財政。辛亥革命後任新政府財政司官員，北洋政府時又出任管理鹽政稅務官。為拒絕與日本人合作，辭官隱居種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多次參觀這個花園，並為此題詞、賦詩。1960年劉將契園送給國家（文革中，花園荒廢，現在此處已成徐悲鴻紀念館）。種菊、賞菊都是某種政治表態。朱德在1949年後退出黨內權力之爭，他以愛蘭、種蘭出名，所到之處都要尋蘭、賞蘭，常常爬山越嶺挖蘭花。即使在政治風暴的廬山會議期間，他仍上山去挖蘭花。蘭與菊的人格象徵類似，朱德對菊也特有鍾情，他每年去契園賞菊，還送給園主人他自己種的兩盆蘭花，配上詩。詩中稱他的蘭是「幽蘭」。1961年中山公園觀蘭花展後，朱德題詩：「幽蘭吐秀喬林下，仍自盤根眾草旁。縱使無人見欣賞，依然得地自含芳。」朱德之愛蘭不僅是觀賞愛好，也帶有明確個人表白，因而他幸運地逃脫了歷次政治鬥爭。張學良被軟禁後在台灣也種蘭花，他的花園就叫「蘭園」，其中名蘭就達數百盆。

花木的人格化使得文人認同某種花木。如失意、感歎生不逢時、官運不濟，會以石榴自比。隋末監察御史孔紹安在唐高宗即位後去投奔，得正五品。另一原先同樣等級的隋官投奔早些，得了從三品官位。孔紹安在待宴時應詔作詩，借詠石榴，歎自己沒有及時趕上機遇：「只為來時晚，開花不及春。」牡丹成為富貴象徵是唐以後的事。雖然《詩經·鄭風·溱洧》提到芍藥：「贈之以芍藥」，但歷來只重視其藥用價值。牡丹一詞出現晚得多，按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說法，最早記載牡丹的，是四世紀《計倪子》一書，但將之視為藥用植物，不久又

被收入無名作者的《神農本草經》。牡丹作為觀賞植物栽種，約始於南北朝時代。牡丹傳入唐長安以後，極為風行，價格昂貴，成為富人專利。白居易從關心百姓疾苦立場出發，不能趕這個時髦。他寫《買花》一詩，抨擊富人以相等於十戶中等人家稅款的價格去買一盆深色牡丹：「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另在《牡丹芳》的結尾說：「我願暫求造化力，減卻牡丹嬌豔色；少回卿士愛花心，同似吾君憂稼穡。」北宋理學家周敦頤並不是隱士，做着官，但為了與世俗撇清，也在《愛蓮說》中表示不喜象徵富貴與榮華的牡丹。

由於花木對人格形象、個人表達如此重要，使得那些沒有象徵意義的花木不受重視。十九世紀歐洲植物採集家抱怨中國園藝的保守，他們不明白為甚麼中國的野生植物資源那麼豐富，但花園植物種類卻那麼少。

中國傳到歐洲的植物中，最著名的可以算玫瑰和茶花了。但這兩種在西方如此重要的花在中國卻沒有重要的文化象徵。在1789年英國班克斯（Joseph Banks）爵士將中國的月季介紹到歐洲之前，歐洲的玫瑰品種都是一年開一次花的。今天歐洲的玫瑰都來自中國引進的月季。張大千1954年在巴西買下地產，花園中原有兩千多叢各色玫瑰，但他認為玫瑰不是「中國花木」，命人全部拔掉，改種海棠、梅、芙蓉、牡丹等「中國植物」。

但偶爾也有例外，紫藤大概是最好的例子。紫藤下垂的花穗實在美麗，它的裝飾性不是其他花木所能代替，因而江南園林、皇家花園、私人住宅普遍種植。然除偶見於詩詞或因其可食性而被收入救荒書外，中國文人對紫藤相當沉默，這與它在日本的地地位形成鮮明對比。紫藤在日本的地

位可以說僅次於櫻花。此外，爬藤攀援類植物在中國文化中具有貶義，這最早見於《詩經·周南·樛木》，其中以「南有樛木，葛藟纍（累）之」、「葛藟荒之」、「葛藟綦之」形容樹木由於掛滿了趨炎附勢的藤類植物而被壓彎了腰。《詩經·王風·葛》中也以葛來比喻無依無靠、不能自立的乞兒「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來乞討。白居易自稱讀《漢書》列傳後，有感於形形色色奸佞害國殃民，遂作《八木詩》，其中有斥攀援植物：「托根附樹身，開花寄樹梢。自謂得其勢，無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暫飄搖。」白居易似乎是道德標準上最循規蹈矩的，他寫了一首《紫藤》，將它比作諂媚小人：「藤花紫蒙茸，藤葉清扶疏。誰謂好顏色，而為害有餘。……豈知纏樹木，千夫力不如。先柔後為害，有似諛佞徒。附着君權勢，君迷不肯誅。又如妖婦人，綢繆蠱其夫；奇邪壞人室，夫惑不能除。」然而，李白卻寫過一首低調讚美紫藤的詩：「紫藤掛雲木，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留美人。」

如今西方的紫藤主要是中國與日本的品種：中國紫藤粗壯茂密；日本紫藤花穗纖細但下垂更長。中國紫藤最早是在1816年從廣州傳到英國，到了1840年種在英國的一棵紫藤已長達55米，覆蓋了167平方米的牆。參觀者絡繹不絕，熱烈讚歎它的美麗，甚至這棵紫藤的花穗、花朵數目都被記錄下來。西方人非常奇怪像紫藤如此美麗的花木在中國文學中竟沒有地位。

二 象徵的變遷與多元

文化象徵在歷史上也會有變化，有時是幾個著名詩人的詩句創造了新

由於花木對人格形象、個人表達如此重要，使得那些沒有象徵意義的花木不受重視。十九世紀歐洲植物採集家抱怨中國園藝的保守，他們不明白為甚麼中國的野生植物資源那麼豐富，但花園植物種類卻那麼少。

歷史上文化象徵也會有變化，有時是幾個著名詩人的詩句創造了新象徵。當詩句廣泛流傳後，新象徵隨之深入人心。自古梧桐為尊貴樹，由於李煜《相見歡》和李清照《聲聲慢》兩闕著名的詞，將梧桐與秋愁固定在一起並廣為傳誦，從此梧桐便成了秋雨、愁思的象徵。

的象徵，當詩句被廣泛流傳後，新象徵隨之深入人心。如梧桐，讀過宋詞、元曲的人不可避免地會將梧桐與秋愁聯繫起來。然而這卻不是梧桐最初的象徵。自古梧桐為尊貴樹，《莊子》中稱「鳳凰非梧桐不棲」。《詩經·大雅·卷阿》中有：「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萋萋萋萋，雍雍喑喑。」以鳳凰鳴於高岡，梧桐生於高岡，適當朝陽，而鳳凰棲止於梧桐之上比喻群賢雲集於明君周圍，後來就以梧桐引鳳來讚譽帝王的德政。自滿得意的乾隆就非常珍惜宮內梧桐。當中南海瀛台的雙桐書屋前的一棵梧桐樹死去，他還為此作了好幾首詩，其中有讚美梧桐的「鷓鴣不敢棲」和惋惜的「認巢好鳥徘徊去」之句，並馬上命人補種一棵梧桐，改雙桐書屋為補桐書屋。後來溥儀也是在補桐書屋接受莊士敦 (Reginald Johnston) 的外國教育。

漢朝時將白楊與死亡、墓地的悲哀相連也為後人繼承。陶淵明輓歌三首中也有「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之句。唐代管理宮殿事務的梁脩仁聽契苾何力背誦的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驚悟白楊的不吉利象徵，立即拔去白楊改種梧桐。可見在唐初梧桐完全沒有愁的意思。唐詩中的梧桐也多半與鳳、琴聯繫，著名詩句有李商隱《重過聖女祠》中的「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白居易寫過頌揚梧桐的《答〈桐花〉》，其中有「截為天子琴，刻作古人形。……受君歲月功，不獨資生成；為君長高枝，鳳凰上頭鳴。一鳴君萬歲，壽如山不傾。再鳴萬人泰，泰階為之平」。雖然詩的本意是發懷才不遇的牢騷，但用的盡是梧桐的高貴象徵。但梧桐畢竟具有與白楊類似的特點，葉大，稍有風雨聲便嘩嘩作響，將梧桐與雨聲聯繫起來似乎是早晚之事。《長恨歌》中已有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落葉時」之詩句；溫庭筠《更漏子》中也有「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將梧桐與秋愁固定在一起並廣為傳誦的還是由於李煜和李清照的詞。李煜《相見歡》有「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李清照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有了這兩闕如此著名的詞，梧桐從此便成了秋雨、愁思的象徵，到了元曲便更程式化了。白楊的多悲風反倒少為人提了。

荷花是另一種有多元象徵的植物。荷花又叫芙蓉、菡萏。《詩經·陳風·澤陂》中已將它比作美女，「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白居易《長恨歌》中的「芙蓉如面柳如眉」更是著名。但是當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後，荷花又是佛教重要象徵，佛便是坐在荷花上。這種情況下，芙蓉的「名」不能用來作佛教的象徵。本來荷花各部分都有不同名稱，花是菡萏，葉是蕸，果實為蓮，根稱藕。蓮(蓮蓬)本來專指果實，採集蓮子的工作通常由年輕女子承擔。紅花綠葉中穿梭的少女成了畫家、詩人喜愛的主題，他們不厭其煩地作各種採蓮曲、採蓮圖。最廣為人知的採蓮曲當為漢樂府《相和曲》：「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李白的《採蓮曲》是：「若耶溪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妝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王昌齡《採蓮曲》為：「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在這些詩中，蓮都是指蓮蓬，但是為

了使佛教象徵與荷花的美女象徵分開，凡與佛教有關時，荷花便稱蓮花。佛的座為「蓮花寶座」，佛教的理想世界為「青蓮世界」——雖然現實中並無青色蓮花。魏晉南北朝正史中屢有蓮花出現與佛法的記載，如三國時魏明帝打算禁佛教毀寺廟，一印度和尚以金盤盛水於殿前，投下一顆舍利子，水中忽然湧起一朵五色蓮花，明帝大驚，感歎說：「要不是真有此靈異，怎能出此奇蹟？」於是便改變態度。荷花也是佛教八寶之一，八寶為：法螺、法輪、寶傘、白蓋、蓮花、寶瓶、金魚、盤長。清代宮中佛堂供器即為此八寶，現存故宮珍寶館。荷花也是佛教藝術中重要的裝飾圖案，這在敦煌藝術中處處可見。

同一植物往往也被賦予不同名以代表不同象徵。不但佛教用蓮，引伸出去凡要讚荷花高潔時，也用蓮而不用芙蓉。周敦頤的《愛蓮說》與其說是讚花，不如說是自我人格的表白：

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以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自這篇《愛蓮說》之後，蓮的出淤泥而不染成了人格高潔、不同流合污的象徵。所以對道學家來說，荷花便是「花中君子」，而要讚美欣賞女性的清新嬌豔便是「出水芙蓉」。在民間吉祥圖中，荷花被廣泛應用，如「連(蓮)年有餘(魚)」的年畫或剪紙，以一枝荷花作「一品清廉(青蓮)」，以吹笙的童子與蓮花、蓮蓬作「連生貴子」圖，以荷花蓮蓬與藕作「因和得偶」作和氣得佳偶，慶良緣佳偶；又以兩朵蓮花開在同一梗上作「並蒂同心」圖祝夫妻和諧、同心協力、百年好合。又以叢生

蓮花喻「本固枝榮」，寓實業根基牢固，興旺發達。常用來賀商店開張。諸如此類，舉不勝舉。

三 外來植物能否成為文化象徵

雖然花木的象徵符號並非一成不變，有的象徵形成還很晚，但外來植物始終沒有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象徵。石榴也許是唯一的例外。石榴原產地為波斯(伊朗)，一般認為是張騫從西域引入，李約瑟卻認為，石榴雖然自三世紀初已為中國人熟悉，但由張騫傳入的證據並不充分。姑勿論石榴是否由張騫在126年傳入中國，但它在漢代就很受歡迎卻是事實，漢武帝修上林苑時就曾植石榴十棵。唐朝時外來植物更多，一些是由進貢而來，還有就是居住長安的外國人也種家鄉花木，而唐朝又有追求新奇舶來品的時尚，石榴作為奇花異果在唐朝自然受青睞。楊貴妃親手在華清宮北側種上石榴，她也喜用石榴花作服裝圖案，石榴裙典故據說也是由此而來。即便如此，石榴在中國文化的象徵意義主要還是在它的果實多子，用以比喻子孫，而不像以上提到的本土植物承載道德、美學的文化象徵。

中國人對花木的態度，一方面用來以物比人，托物興詞；另一方面又極其實用，這種實用態度使得外來植物雖未成為重要文化象徵，卻很快被接受並成為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觀賞植物的食用性、藥用性在中國人是理所當然的事，還有一些植物，如桃、茱萸等還具有辟邪的作用。如石榴為各類醫書收入，它的皮、果、花均有藥用，子(果)可醒酒、止瀉、治腹痛；皮可「治筋骨風，腰腿不遂，行步攀急疼痛……卒病耳聾……」；石榴

雖然花木的象徵符號並非一成不變，有的象徵形成還很晚，但外來植物始終沒有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象徵。石榴也許是唯一的例外。它在中國文化的象徵意義主要還是在它的果實多子，用以比喻子孫，而不像以上提到的本土植物承載道德、美學的文化象徵。

中國人對花木的態度，一方面用來以物比人，托物興詞；另一方面又極其實用。觀賞植物的多用性是一項中國傳統，這使得外來植物雖不具有較高文化象徵，但因其實用性而很快被廣泛種植。中國園藝書除教人如何照顧花木，還告訴讀者花木每部分的藥用性。

花可治出血等等。《救荒本草》這類書就是收錄可食用植物，以備荒年救人。事實上，《救荒本草》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橚所作，他在1378年被封為周定王，一生主要興趣便是編這本書。該書於1406年出版，收錄了414種植物，其中276種是以前書籍中從未記載的新物種。他不但汲取前人留下的經驗，從鄉間農夫處收集植物，自己在住處開闢專種救荒植物的「圃」，種了超過四百多種的植物，召了畫工，精確地畫出各種植物各部分的圖，以便人們準確地辨認植物。

以1987年經園藝界與各界評選出的「中國傳統十大名花」為例：梅、牡丹、菊花、蘭花、月季、杜鵑花、山茶花、荷花、桂花、水仙，十種花內沒有一種不是可供食用或藥用的，其中大多數還可多用。又如紫藤不但可作救荒食物，也是做點心的材料，北京特產「藤蘿餅」、「藤蘿糕」便以紫藤花瓣和麵、糖做成（北京稱紫藤為「藤蘿」）。中國人對食用花卉習以為常，而現代西方人則將觀賞植物與食用蔬菜分得較清。

茉莉花三世紀從波斯傳來後，到唐時在南方已普遍種植。古人稱它為「狎客」、「遠客」。中國人不但用它做香料，還做成茉莉花茶。李時珍《本草綱目》便有以花「蒸細取液，作面脂頭澤，長髮潤燥香肌，亦入茗湯」。而它的根混在酒內服則有麻醉、止痛的作用。到了現代，茉莉功用越來越多，可以做魚、煮銀耳，藥用也比《本草綱目》所列多得多。鬱金香原產地中海、土耳其，何時傳入中國已不清楚，但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已有記載，顯見比傳入荷蘭要早。它主治「蠱野諸毒，心腹間惡氣鬼疰，鴉鵲等一切臭。入諸香藥用」。中美洲的雞蛋花（Frangipani），十六世紀時由西班牙人傳到馬尼拉，然後傳播到亞洲各地，

它在中國也很受歡迎，尤其在寺廟更普遍種植。據說雞蛋花瓣可用來泡茶，也具藥性。更令人驚訝的是，引進歷史更短的「新潮」花卉也被標上種種藥用。如大麗花「全草可入藥」，根有清涼解毒、消腫功效；蟹爪蘭可治瘡疥腫毒等等。

不論如何，觀賞植物的多用性是一項中國傳統，這使得外來植物雖不具有較高文化象徵，但因其實用性而很快被廣泛種植。中國園藝書除教人如何照顧花木，還告訴讀者花木每部分的藥用性。

外來植物難以進入文化象徵系統，也並非中國獨有。中國蘭花自宋代傳入日本後也深受喜愛，視為高雅花卉。君子蘭（Clivia）原是南非植物，1828年引入歐洲，1854年傳入日本。滿洲國時期日本人將君子蘭送給溥儀，稱為「金色友誼蘭」（the Golden Friendship Orchid）。1934年被幾何圖案化（stylized）的君子蘭正式作為滿洲國的象徵。1935年4月溥儀訪問日本時，君子蘭又被正式作為滿洲國皇帝紋章圖案。

日本人贈送君子蘭以及顯然在日本人授意下或是溥儀在主動取悅日本人的心理支配下，將君子蘭代替傳統中國皇帝的龍的形象，均含有深刻政治意義。各種資料對君子蘭傳入長春的時間也說法不一，連長春市政府出的地方史也語焉不詳，這就令人不解了：「（君子蘭）本世紀30年代由日本引自長春，當時僅為偽滿宮廷及官宦宅邸觀賞栽培。長春解放後，君子蘭從宮廷流入民間，逐漸發展起來。」看來，官方與民間對君子蘭傳入中國的政治背景都不清楚。

滿洲國失敗後，君子蘭的確流入民間，長春成了中國培植君子蘭的基地。80年代，長春掀起了瘋狂的君子蘭潮流，價格達飆升至數以十萬元計

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張辛欣曾寫報告文學《瘋狂的君子蘭》描寫這種狂熱。1984年長春市第八屆人大常委會十四次會議正式選定君子蘭為長春市市花，並作為國家禮品贈送給外國領導人；長春市政府還把君子蘭作為市禮品贈送給人民大會堂。在中國花卉市場上，君子蘭屬昂貴花木。可君子蘭在西方卻是易活普通的植物，通常種在街道邊、家庭車道旁或花園角落，只是一種點綴植物。君子蘭之所以在中國特別受到寵愛，我認為與它的名字有關。這個名使它與傳統象徵聯繫起來，躋身於名貴花卉行列。

中國人在給外來植物取名時往往借用本土花木的名，這樣固然可以喚起文化上的認同與親切感，但也造成混亂（定名的混亂當然不限於外來花木）。如Fuchsia叫吊鐘海棠，但它與海棠完全無關。Merigold叫萬壽菊，也與菊無關。墨西哥來的仙人掌科的令箭荷花也同樣與荷花風馬牛不相及。

四 結束語

總而言之，中國人對園林植物的態度是象徵意義遠重於觀賞價值。觀賞趣味可以是個人的，而象徵符號則是文化的，因而也是群體的，個人沒有改變象徵符號的自由。只要受中國文化影響的人，都被這種集體的表達方式約束。前面提到的契苾何力為西域人（契苾原為部落名，後成為姓，如今說來當是土耳其部落之一），為唐太宗立下許多戰功，成為唐代軍事重臣。他顯然深受漢文化影響，所以也會這樣看植物。80年代末，為表彰李約瑟對中國科技史的貢獻，劍橋大學決定建立李約瑟研究所，參與籌建的著名漢學家一致建議並親手種植了竹

子。對於李約瑟一生的追求與貢獻，似乎唯有竹子才能相配。

魯迅曾嘲笑上海租界闊老種了幾盆菊花便假冒風雅學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了。但另一方面，無論是假冒還是附庸風雅，不可否認的是，風雅在很大程度上被程式化了。象徵符號傳達的資訊是固定的，你希望向外界傳達甚麼樣的資訊，希望塑造甚麼樣的人格形象，都有早已規定了的模式可仿。當然，被程式化的並非只有花木，生活方式的許多方面都如此，只不過花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當中國人尋找植物的實用價值時，其發現之早、搜集之廣往往使現代學者驚訝。無論朱橚的《救荒本草》還是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在植物學上的貢獻都超過當時歐洲學者，但當選擇園林植物時便受集體表達方式的制約，完全沒有「求全」的要求。與此相反，西方園藝界則竭盡全力收集新品種，他們選擇園林植物的標準也很「客觀」——就植物論植物，或取其花，或取其葉，或取其香味。然而中國的情況近年也在改變，西洋花卉，尤其是一年生的球根類花卉大量引進、形成時髦，這不但在改變中國傳統園林的景觀——大片大片一色花卉，整齊、開闊的布局代替傳統園林曲徑通幽——也無法預料對中國傳統花木觀在長期有何影響。

葉曉青 現任澳大利亞麥克理大學亞洲系高級講師。主要研究領域有中國科技史—醫學史、中國近代社會史，尤其是十九世紀上海史。目前研究項目為清代宮廷與戲劇。主要出版物有 *The Dianshizhai Pictorial: Shanghai Urban Life 1884-1898*。

中國人對園林植物的態度是象徵意義遠重於觀賞價值。觀賞趣味可以是個人的，而象徵符號則是文化的。當中國人尋找植物的實用價值時，其發現之早、搜集之廣往往使現代學者驚訝。但當選擇園林植物時便受集體表達方式的制約，完全沒有「求全」的要求。